



「不要國王」抗爭運動的反思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不要國王」抗議與民權運動前後呼應

6月14日，美國多個城市展開了「不要國王」的反特朗普示威活動，估計參加人數高達五百萬，參加者高呼「反獨裁」口號，其中一場遊行的地點是在喬治亞洲亞特蘭大市，亞特蘭大市抗議活動的人數上限是五千人，但很快已經滿額，結果另外有數千人被擋在鐵欄外。示威者穿過的路線之一是馬丁路德金國家紀念公園，當時筆者和太太正在那兒，我舉起了攝影機，捕捉了這歷史性的一幕。我可以輕而易舉地加入遊行行列，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並不是完全同意抗議者的訴求，例如有些示威者要「打碎」遞解非法移民的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其中一位示威者舉起的標語牌子顯示出特朗普的輪廓，頭部有一個紅色的鏢靶，牌上的文字是：「下一次不要再失手！」這是公然鼓吹暗殺。不過，示威者大部份標語都是環繞着反獨裁的主題，例如「對抗法西斯主義」、「不要警察國家」……等等。

馬丁路德金國家紀念公園是二十世紀1950、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發源地，這地方孕育了對抗不公義制度和種族主義的種子。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隱隱約約地具有種族主義的色彩，特朗普不單止打擊非法移民，亦限制合法移民，而南非白人卻是例外。七十年之後，「不要國王」抗議遊行在馬丁路德金國家紀念公園展開，兩場運動遙遠地前後呼應，對我來說，真的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民權運動的成功，是體制內的改革結果，一方面，種族隔離政策是不公義的制度，但另一方面，美國政治制度保障了人民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抗議的權利，故此馬丁路德金牧師能夠領導這一場波瀾壯闊的改革運動。簡單地說，制度的設計是公義社會的關鍵。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

優良制度與敗壞制度的分別

曾經有人對我說：「一個好人落入一個敗壞的制度下，最終也會變成壞人；相反，一個壞人在一個良好的制度之下會受到箝制。」管理學大師愛德華・戴明（Edwards Deming）曾經說過和上述前半節類似的說話：「壞的制度經常打垮好人（A bad system will beat a good person every time）。」戴明的核心理念是：組織中的大多數問題源自於系統，而非個人。他認為，管理階層的首要責任是理解和改善系統，而不是將缺陷流程固有的失敗歸咎於個人。雖然這句話是針對商業管理學，但也可以應用在政治層面。

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則說過類似上述後半節的話：「權力製衡使壞人也能為公眾利益行事（Checks and balances made it advantageous even for bad men to act for the public good）。」威爾遜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也是《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簽署人。這句話源自於十八世紀末圍繞著美國憲法的辯論。開國元勳敏銳地意識到，當權者有人性缺陷、自私自利，甚至腐敗，僅僅信賴官員的美德是不足夠的。因此，他們刻意地設計一個即使「壞人」掌權也能正常運作的制度。



善良的家庭在神權制度下反目成仇

若果馬丁路德金牧師領導的民權運動和今天的不要國王運動發生在極權國家，我很難想像結果是怎樣。最近我看了一部2024年的伊朗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神聖無花果的種子》（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故事背景是一位年輕的庫德族少女因不當戴頭巾而被道德警察逮捕致死，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這故事的主軸圍繞著伊曼（Iman）的家庭，伊曼是德黑蘭革命法院的調查法官，其職責是調查案件，然後做出判決。但伊曼的上級要求他在不評估證據的情況下批准提交的判決，包括宣判死刑。他得知他的前任因拒絕這樣做而被解僱，起初他也拒絕合作，但面臨巨大的壓力下，他最終妥協了，當時抗議活動遍地開花，他每天簽署數百份判決書。伊曼兩個女兒的一位朋友被警察打成重傷，後來被逮捕。伊曼的女兒討厭父親淪為政權的幫兇，其中一個女兒甚至偷了父親的佩槍。整個家庭因此而支離破碎，男主角與太太、女兒彼此猜忌，互相爭鬥。最後，女兒甚至誤殺了父親。

電影落幕之際，我真是不勝唏噓。在故事裏面，其實整個家庭的成員都是善良的人，伊曼起初拒絕簽發判令，然而，若果他不服從，那麼自己和全家都可能被政權迫害。但他的太太和女兒卻不明白他的苦心，反而不齒其所為。這個神權制度迫使至親摯愛的人反目成仇，女兒甚至變成了殺父兇手。而蔓延至全國的抗議運動，最後亦被鎮壓下來，說穿了，極權體制就是一池死水。在現實中，拍攝《神聖無花果的種子》的導演穆罕默德·拉蘇洛夫（Mohammad Rasoulof）被伊朗政府判處八年監禁，他流亡到德國，才能夠逃過一劫。

優良體制容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變

正如威爾遜所說，壞人在良好的制度下會受到箝制。1950年代初，參議員麥卡錫利用公眾恐懼共產主義的情緒，發起肆意指控，毀了無數無辜者的人生。但在1954年聽證會上，他的伎倆被公開曝光，參議院正式譴責麥卡錫，結束了這場「紅色恐怖」。1973年，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因擔任馬裡蘭州州長期間接受賄賂和逃稅而接受調查。儘管面臨政治壓力，司法部仍獨立調查此案，阿格紐最終被逼辭職。大約在同一時期，水門事件揭露了尼克遜總統濫權，他企圖掩蓋共和黨人偷偷地闖入民主黨總部的醜聞，在傳播媒介、國會聽證會以及最高法院的努力下，最終尼克遜黯然下台。

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在防止獨裁者濫權、維護司法獨立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2017年，特朗普解雇了負責調查俄羅斯干預2016年大選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羅森斯坦任命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為特別檢察官去領導調查。特朗普向羅森斯坦施壓，要求他縮短調查時間，甚至要解僱穆勒。但羅森斯坦以辭職為要挾，表示自己不會執行任何非法命令，好讓穆勒的團隊相對獨立地進行工作。

以上例子屬於政府內部的監管和制衡，但在民主國家中，亦有許多自下而上的政治動員，例如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後，人民不滿意政府無作為和金融機構不負責任的投機，因而組織了「茶會運動」，這場運動迫使溫和派共和黨人辭職，並且在選舉中落敗。此外，2020年白人警察拘捕黑人疑犯弗洛伊德時採用過度武力（跪頸），導致弗洛伊德橫死，這事件激發起全美五十州都爆發了抗議活動，其中多場示威活動是由當地的黑人命貴（BLM）分會領導的，雖然黑人命貴運動頗具爭議性，例如領導層的財政不透明，但這些示威活動重新引發起關於警察暴力、種族主義的討論。「我也受過性侵」運動（me too movement）是另一個好例子，最初這只是個別揭露性侵者的事件，後來演變成一場席捲全球的運動，這場運動亦有爭議的地方，例如控訴的門檻很低，很容易造成冤案，但總括來說，這場運動改變了職場規範，並在多個州促成了法律改革。



而最初提到的民權運動則是自上而下和自下以上的配合。除了馬丁路德金牧師領導的公民抗命外，政府高層亦銳意對付種族主義，例如1957年艾森豪總統派遣聯邦軍隊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強制廢除種族隔離，保護了九名黑人學生免受暴徒和州長的迫害。繼任的甘迺迪總統受到黑人拒絕在公車上與白人分開等抗爭活動的激發，於1963年發表了全國電視講話，宣稱民權是一個「道德問題」，後來他更提出了《民權法案》。甘迺迪遇刺後，約翰遜總統通過了1964年的《民權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權法案》。

結語

基督教清楚地指出人性的敗壞，在優良的制度裏面仍然會有獨裁傾向和濫用權力的人，如果沒有持續的反省、批判，民主便可能會出現退潮的現象，這情況已經出現在土耳其、波蘭、匈牙利、巴西，現在可能出現在美國。

馬丁路德金的妻子科雷塔·斯科特·金恩（Coretta Scott King）曾說：「鬥爭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自由永遠不會真正贏得；每一代人都需要努力爭取，才能贏得它。」這句話概括了民權運動的核心理念以及她畢生的行動主義。她呼籲我們採取行動，若果停留在前幾代人的成就上，可能會帶來倒退的風險。科雷塔的名言與孫中山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異曲同工之妙。

回顧以往的歷史，我對美國和世界的前景仍然抱有一絲樂觀，因為民主制度保存着許多抗爭、修正、改革的空間，這些空間容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努力得以發揮。我相信「不要國王」運動只是一個開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要國王」抗爭運動的反思〉

2025年6月13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